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

杜满昌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广东珠海 519000)

【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这些光辉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东贡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众多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关论断，直接或间接地充实、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无产阶级应掌握革命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通过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革命，才能实现本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践证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并且掌握革命的领导地位才能胜利。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

无产阶级能担任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应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是1925年的中共四大上正式提出的，而早在1922年的2月26日的《青年周刊〈宣言〉》一文中，杨匏安就对该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中国近世的社会制度都应改造，实行“社会革命”，也是“当前的任务”，无产阶级能担任革命的任务的原因在于“他们最近都有了觉悟，都晓得采用那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了”。杨匏安还指出，无产者以外的各个阶级并不具备革命的坚定性，他们“虽然感着自己内部冲突的苦恼”，但是却“不愿意变更”，因此，“劳动者应该负这社会革命的使命。”^[1]杨匏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探讨，彰显了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敏锐性、前瞻性和科学性。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表现出的两面性的事实，使得包括杨匏安在内的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要与农民结成联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于农民问题认识不够，随着革命的发展，如何让饱受压迫的农民也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摆在幼年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杨匏安在《青年周刊〈宣言〉》一文中，初步提出了联合农民的思想。他说，“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大部分，都出自农民劳动”且“农民受地主的苛虐，一天甚似一天”。因此，我们“要指导他们向着转变的

道路走去”，使之联合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实现土地公有公耕之利益。^[2]杨匏安的上述论断随革命的深入进一步得到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是否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领导农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于是党在1925年四大上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强调联合农民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领导权。1919年后的中国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因革命的领导权转换到工人阶级手中。那么，革命胜利后，由谁来掌权呢？杨匏安强调无产阶级绝不能放弃革命的领导权，他说：“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第一步既然联合，第二步马上要反目了。因此，无产阶级刚刚踏着第一步的时候，不可不预定第二步的战术。”杨匏安还指出，在反封建的斗争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需要联合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组成联盟进行斗争，而革命一旦胜利，就必须和资产阶级决裂，把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对象，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被窃取。^[3]显然，杨匏安提出的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革命分“两步走”的论断，是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学说基础上得出的客观结论。这个论述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为毛泽东的“革命两步走”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渊源。不仅如此，该论断提出的时间还早于陈独秀的错误观点“二次革命论”提出时间，这更彰显了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精神。

总之，以杨匏安为代表的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得到了中国革命实践检验，它为毛泽东深入开展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论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工人运动是实现自身自由与解放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运动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实现自身自由与解放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工人运动，产生了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粤籍的苏兆征、林伟民、杨殷、杨匏安、邓发、刘尔嵩、周文雍

等更是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们在实践中探索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阐释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

工人运动以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迫为目标。广东地区开埠较早,是近代以来诞生第一批产业工人的地区之一,面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侵略,苏兆征疾呼道:“我们要想不受压迫,就得要斗争,这样才有出路。”^[4]林伟民说:“只有走上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当家做主人,才能真正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才能过上共和幸福的好日子。”^[5]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发动工人运动的直接目标定位为反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压迫,显然这个论断符合旧中国的国情。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在理论上如此论述,在实践上也亲力亲为,比如,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让所谓威风八面的大英帝国主义,在海员的威力之下垂下了头。

团结起来是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保障。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深知团结的重要性,因为在强大而残暴的敌人面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又人数较少的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把力量凝聚,形成战斗的合力,增添胜利的砝码。苏兆征常对工友们讲:“老板,包工头经常这样凌辱我们,难道我们能够这样甘心忍受下去吗?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与他们斗争,日后难保有一天就会落到我们自己头上。”^[6]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苏兆征、林伟民不但大力倡导海员工人内部要加强团结,战斗不息,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强烈呼吁建立工农兵大联合,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军阀,以实现革命胜利。正是有了上述思想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不但加强了工人阶级自身内部团结,而且与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华侨、国民党左派、国际社会结成反帝同盟。省港大罢工之时,中共领导的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罢工委员会,更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得参与罢工的各界人数,在6月份达25万之多,在党领导的罢工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工会是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阵地。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中,深深懂得要反抗压迫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建设好工会,才能确保工人运动有坚强的后盾和阵地。尤其是苏兆征从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成果丧失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工会建设的重要性,于是下决心要加强工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是加强工会的组织”,并提出“使我们的工会更深地在群众中扎根”。^[7]林伟民也撰写有关工会建设的文章下发,以便让工人尽快学习组建工会的有关知识和方法。这些文章不但阐释了建立基层组织的必要性,而且详细地制定了工会基层组织表和训练方法。林伟民、苏兆征的上述思想巩固和壮大了工会,加强了工会的战斗性,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阵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鉴于林伟民在组织工会方面显著成就,1925年5月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首任委员长。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工人运动思想,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掀起了被称为“第一怒涛”香港海员大罢工、声势浩大的省港大

罢工。他们的理论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广泛深入开展提供了宝贵建议,也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工运史。

三、农民运动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他们的解放必须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来才能实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因此,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成功地组织领导广大农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成为胜利的关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南粤大地产生了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黄学增等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他们不但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理论,而且对其有深刻的诠释和发展。

饱受压迫的中国农民必须起来斗争。为了摸清旧中国的农民饱受压迫的程度,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入调研、科学地剖析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彭湃指出“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彭湃还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经济侵略,使得工商业及手工业遭受极大破坏,再加上帝国主义操纵军阀混战,导致各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因而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生活凋敝,只能卖其土地,来维持生计,“遂全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面对如此的生活窘迫,农民出路何在呢?阮啸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彭湃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要求解放,农民也是一样要求解放。但是工人农民要求解放,除了革命一条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跑。”^[8]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农民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科学地诠释中国农民问题,他们不仅仅分析出农民受贫困的原因,还科学地指明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出路。

农民运动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近代以来,各个阶级、阶层为了探索民族出路作了自己的努力,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都失败了,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五四运动后,革命的发展已经证明,工人阶级的才是新的领导力量,而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因此,如何联合农民,让他们起来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成为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入思考的问题。彭湃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要研究“工农联合问题”。^[9]阮啸仙认为,农民阶级由于受到小农经济生产的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独立自己的问题自己是不能解决的,“必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结成很好的战线,然后可以成功”。阮啸仙还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农民就是工人阶级长期奋斗的革命同盟者。”^[10]显而易见,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上述论断是总结近代中国革命历程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客观结论,同时也阐释清了农民翻身做主人要依赖工人阶级来领导的道理。

农民阶级必须武装起来。旧中国的“三座大山”武装到了牙齿,极其残暴,手持棍棒和锄头的农民必须武装起来方能革命成功。阮啸仙呼吁劳动者拿起枪械来担保自身的自由。他说到,军人、劳工、农民携手,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向资本主义进攻。彭湃也强调了农民拿起武器的重大意义,在领导广宁县农民斗争时,面对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他指出:“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

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11] 上述的论断彰显了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观为指导，深入剖析中国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确如此，旧中国人口的80%是农民，将农民武装起来，党就会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和后备军，工人阶级也就拥有了可靠的联盟。

总之，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农民运动的阐释是多方面的，这些精辟的论断，成为了农村革命持续开展的强大动力，使得广东成为农民运动的发起地，举办了一到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土地革命中第一个土地法规。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农民运动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相关理论的创建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四、无产阶级应建立广大的同盟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要把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建立新的组织形式，来斗争残暴的敌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先进的工人阶级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为壮大自身力量，必须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匏安、杨殷、苏兆征、邓发等在革命的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联合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近代中国，多种矛盾叠加，客观上为代表先进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杨匏安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各阶级、阶层与政治派别的状况，提出了对学生、妇女、军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等流派的具体的统战策略，号召他们“赶快和我们携手，从事阶级的争斗”。^[12] 上述论断的科学性在于它的切实可行，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较少，而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否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于能否正确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能否将他们团结起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农民饱受压迫，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样也饱受压迫，使得他们完全有可能齐聚在革命的大旗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着共同的敌人冲锋。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四次统一战线的建立也验证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联合作战。将资产阶级联合在革命的阵营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这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匏安，不但科学地区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而且着重指出无产阶级要战胜当前的主要敌人，必须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他强调在资本主义发展最落后的中国，在政权尚掌握在军阀官僚手中的条件下，“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在这第一步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联合作战，来“增大革命势力”。^[13] 杨匏安的上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作战的文章，发表于通过国共合作政策的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彰显了他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水平在党内处于前列。

不能助长资产阶级的势力。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后，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呢。我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导

致北伐战争中，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升。而早在1922年，杨匏安对这个问题就有精辟论述。他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俄国二月革命、德国1918年革命的教训为例进行了阐释。他认为，若封建特权被打倒了，但此时的资产阶级还尚未树立根底，无产阶级“主张参加资产阶级、民治主义，助其制度的确立，这也是反动的行为”，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两者的战术和企图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无产阶级要提前谋划制定好反目的第二步战术。^[14] 上述关于无产阶级应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论断，彰显了杨匏安在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把握。实际上，这个理论也是对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初步阐释。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尤其是杨匏安，在中共早期就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深邃的思考。他的这些论断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思想动员，助推了大革命的发展，也为统一战线成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作了理论的铺垫。

五、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革命问题皆指向国家政权，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发展武装、暴力革命是最主要的手段。在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诞生了军事家叶挺、叶剑英，为党的军队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彭湃、杨殷、黄学增等人。他们很早就注意到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的重要性，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

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靠旧式军队是不能达成革命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深感建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新型军队的重要性。我党在叶挺独立团建立之始，就成立了中共叶挺独立团支部，这应该看作是党指挥枪军事原则的萌芽。叶剑英也较早地认识到党指挥枪的重要性，提出了“军以党化，党以军成”的思想。^[15] 新型军队还要坚持思想建军，因此，杨匏安强调，要让官兵在思想上意识到“我们注重军队的运动，就是使他们知道平素的给养，通通是无产阶级的汗水”。^[16] 而叶挺的治军更是突出“红”特色，早在肇庆练兵时，他就倡导“红，才能打胜仗”。^[17]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和实践，为“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作了前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以革命的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游击战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彭湃领导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后，为保卫红色政权，提出“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的思想，^[18] 为此，彭湃领导海陆丰较早地形成了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三级军事系统，首创了全民武装的范例。南路的黄学增、王文明等领导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后，为保卫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他们创建工农武装，发展琼崖红军，在琼崖反“围剿”失败后，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得到掩护，又从这里掀起革命狂澜，迎来全国解放。上述革命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使得广东成为人民武装的创建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创建(下转第40页)

